论张恨水小说的新闻性与副刊媒体的关系

方维保 汪 注

晚清时代的文学和报人是二位一体的，他们共同寄生于当时发达的报纸和杂志等媒体之中。张恨水承续晚清到民国这一历史转型时期文化人存在的传统，他一直以报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现代文坛。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新闻性，这一方面与他的报人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小说发表于报纸副刊这一载体有关。

一、小说家与报人的双重身份

张恨水走上文坛之初，从事的就是报纸新闻职业，他的文学创作也大多发表于报纸和杂志尤其是报纸之上。张恨水的主体身份是双重性的，——报人与小说家。

在报人与小说家这二者中，张恨水更看重报纸新闻的影响力，他不但从事记者这个职业，而且充当报纸的编辑，充当副刊的主笔。张恨水自己也说过：“我的主要职业是做新闻记者，写小说不过是性之所好。”事实上，文学写作对于张恨水不过是“副业”，他的终身职业是新闻记者。从1918年在芜湖《皖江日报》当总编辑正式开始记者生涯，到1948年辞去《新民报》的所有职务，张恨水从事新闻工作长达30年。曾任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益世报》助理编辑、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协助成舍我创办联合通讯社兼任北京《今报》编辑、任《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编辑、自办《南京人报》、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等，他的一生都和新闻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出色的报人。

在报人这一身份之下，张恨水更多的时候是报纸副刊的编辑。在几十年的报人生涯中，张恨水的支撑点当落在报纸副刊上。在北平，他先后主编过《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世界日报》副刊“明珠”、《新民报》副刊“北海”；在上海，他又主编《立报》副刊“花果山”；在南京，主编《南京人报》副刊“南华经”；在重庆，主编《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等，他的生命光华及报人才情主要倾注在副刊上。

副刊作为新闻纸的“附件”，也具有新闻性。这是由副刊的新闻附属性所造成的。报纸副刊，包括文艺副刊，与一般的独立的文艺杂志不同，它具有新闻性。一般来说，报纸副刊多属报纸的衍生物或者说附属产品，依附性强。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主角当然是新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特别在今天信息时代，媒体中大量新闻信息的传播才是广大读者最为关注的。作为报纸的副刊，当然要紧紧围绕报纸的“新闻中心”来选素材，列选题，发作品。这是当代报纸副刊的正确选择。

有人认为：报纸的副刊“必须引进新闻的新、快、活、短的手法和元素去打造副刊，创新副刊。对一些重大问题、事件和活动应有相应的呼应，副刊在新闻纸上的表现不可能一个劲地小圈化、私人化，她的主要读者群的定位一定要准确！”“与一些实时报道的新闻相配合”，“而且，一些杂文的针之时弊也是有一定新闻要素的。” 其实，晚清时代的新闻性的报刊杂志，对于时事新闻极为关注的；它的副刊是相对独立，有时甚至与主刊“打架”，但有一条，它对于新闻事件也是极为关注的，只不过关注的形式不一样。

记者出身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张恨水特别喜欢用媒体的眼光看问题，较之于一般的书斋文学家更喜欢在小说中加入新闻的元素，以小说介入社会热点问题，社会大众关注的时事政治问题。同时，张恨水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的经历，使得他的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小说，大多能够借助于报纸副刊得以发表和连载。这两个方面都使得他将报纸和副刊的新闻性带入了小说创作之中，尤其带入了报纸连载小说的叙述之中。报人本位的身份，这几乎是命中注定使他要以新闻从业者的眼光来从事文学创作，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摄入新闻元素。

二 、张恨水小说的新闻性修辞

媒体人的文学创作，不但在选题上，而且在遣词造句上，都会吸收新闻性修辞。在张恨水的小说中，这种新闻性的修辞非常的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以隐喻的形式介入时事新闻。

张恨水作为报人的时期内战频频，政治生活缺少稳定的“游戏规则”，舆论环境极为严峻，报人稍有不慎，轻则失去饭碗，重则死于非命。在这样的环境下，张恨水使用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其对生活的认识与评判，把大量的新闻事实、社会黑幕通过“改写”融入小说作品想象之中。张恨水在谈到《春明外史》时曾说，“《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一条路子。” 虽然《春明外史》最终没有成为《儒林外史》但作家还是对于现实生活给于充分的关注，给于讽刺。所谓《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的路子，实际上“黑幕”小说的路子。这些小说运用晚清小说惯用的政治影射的手法，“对政界、新闻界、军界、教育界、商界的各种‘黑幕’进行描写” 。

这类主题在《魍魉世界》《纸醉金迷》《五子登科》《八十一梦》中都有表现。它们所切入的都是当时市民阶层所关注的公共话题。有的小说就是新闻材料的改写，有的人和有的故事甚至可以与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能够对应，读者当然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如《金粉世家》中的金铨总理，读者显然可以将其当时的民国总理对号入座；金铨家的子女的情感生活，读者也可以将其与某一位民国子女的情感纠葛相联系。

新闻性的小说叙事一方面可以以虚构作为掩护，借助文学进行隐蔽的政治表达，能够比较自由地触及政治的敏感的话题；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因新闻的对号入座而明确树敌，起到自我保护作用；尤其是能够利用小说叙事的符号特征，而将文学的触角伸入整个社会这一软性层面，扩张了小说的内涵，将新闻事件的涵义局限，放大为社会的公共现象。

（二）以直接陈述的形式介入新闻时事。

隐喻性的修辞介入，主要提供的是类新闻的草蛇灰蓝，引导读者作现实联想；但是，也常常使得被隐喻的人和事，有逃脱的借口。所以，张恨水的创作之中，也经常采用直接陈述的新闻修辞的方式。

直接陈述的新闻性修辞，在张恨水的杂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张恨水通过短评的形式来发表自己对社会新闻事件的见解。他认为：“报纸上文字，是要配合时间的。”“南惨案”发生时，张恨水在《世界日报》副刊上接连发表了《耻与日人共事》《亡国的经验》《中国不会亡国》等一系列短评，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他把重庆《新民报》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1938年1月15日的发刊词《这一关》中他这样说道：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含在内。”

他亮出了以抗战为己任的鲜明旗帜。因此，他也为这个副刊规定了内容范围：1、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2、游击区情况一斑；3、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4、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5．抗战韵文。

张恨水以“关卒”的笔名，在副刊《最后关头》上呐喊，不仅以诗文、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共同抗战．而且还用漫画等形式来讽刺揭露汉奸的丑态。对于新闻版面上不宜谈的事，他的副刊文章往往旁敲侧击，却能切中时弊。

除了杂文，张恨水在小说中，也经常采用直接陈述性的新闻修辞。在许多小说中，他直接新闻纳入到小说的叙事之中。反面的例子是《八十一梦》《魑魅魍魉》中，他就是用黑幕小说的形式，直接将抗战时期的黑暗新闻事件直接改写进入小说之中。小说中许多的荒诞的故事，与现实中的许多真实的新闻事件，对应性非常强。而正面的例子则是《虎贲万岁》。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以纪实的笔调叙述了抗战中代号“虎贲”的五十七师的常德战役。把五十七师的抗战事迹以现场纪实的画面的形式展现了出来，使得读者身临战场。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采用了“新闻事实+虚构”的叙述方式。即基本事件是新闻的，但过程的描写、悬念的设计、心理的揭示则有虚构。 尽管如此，小说的虚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下面是其中一段恋爱的场景：

婉华站在门口的一层石阶上，低低地叫了一声“坚忍”。他和她相隔不到一尺路，便转过身来，他站在坡子下的一层，两人正好一般高，便伸着手握了她的手道：“你还有什么话？”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看这整个常德城，多么清静呀，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坚忍道：“大雷雨的前夜，空气照例是这样一切停止的。你害怕吗？”

她摇了摇头，但立刻觉得这星光下，他是不会看到什么动作的。便继续道：“我不害怕，不过这样清静的环境下，我情绪是不能安定的。”他把那只手也握了她的另一只手，两个人影，模糊着更接近了。约莫有三四分钟，他突然道：“婉华我告别了，祝你前路平安。”他立刻转身向前，皮鞋踏着路面的石板，一路啪啪有声。

在这样的直接陈述中，作品中所叙述的对象及其事迹与现实中的对象具有非常强的对应性。因此，它的新闻性非常的强。这开始了后来包括文学，尤其是1950年代有关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写作的滥觞。

这两种直接性的新闻修辞，都使他的创作呈现了鲜明的副刊性。当然也使他的创作与副刊与社会新闻事件紧密配合，遥相呼应。

张恨水通过小说创作、短评写作等，把社会新闻事实融人到副刊中，使副刊在具有文艺性的同时，也具有了鲜明的新闻性。重视副刊的舆论监督作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张恨水强调副刊也包括小说想象的“舆论监督”作用。

三、张恨水副刊创作的传播和互动机制

张恨水的报纸副刊文学创造了中国现代报纸副刊文学的辉煌，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他在副刊上发表的连载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他几乎囊括了北平各大报的连载小说；30年代，他又包揽了中国南北报业中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的连载小说，包括《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红极一时，以至于当时的群众为了追看当天张恨水的小说连载而在报馆门口排队等候买报。

张恨水的报刊创作，其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作者和作品与市场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因为他的小说发表在报刊上，尤其是副刊之上，这些作品被及时地送到读者的手里，读者以及由读者所构成的市场，也就能够及时作出反馈，小说的新闻性、市场消费特性，以及市场的营销特性，都最终反馈到作者那里，并获得积极的回应，并在叙述文本中体现出来。它与传统的文学观念，阻断市场和消费的反馈渠道有着很大的不同。张恨水的报纸副刊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实现了一场阅读和创作的“革命”。

在这种互动之中，张恨水实现了对于现实的干预欲望。张恨水的这些副刊小说，显然不再是一个传统文人对于风花雪月的吟诗洒泪，而是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把社会新闻集合到小说中，使小说与新闻事件紧密水乳交融，反映社会的最新动态及现实生活中的世态百相、人情冷暖。中国作家，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记者作家更愿意以小说这种虚拟的方式吸纳、集合各种有趣的新闻，试图借此表达自己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张恨水把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干预现实的愿望，通过自己的报纸副刊创作实现了。张恨水借助于报纸的及时送达的传播渠道，把自己对于社会事实的立场和观点，迅速传达给了读者，从而最大限度也是最快速度地影响了读者和社会公众。他实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张恨水的小说显然具有了介入公共话语的权力。

关注现实和传达现实的生活信息，是报纸的特性；而以报纸副刊为载体的副刊文学，必然具有表现内容的世俗性，和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特性。它总是关注现实的生活，尤其是带有时效性的社会新闻，从而使得副刊文学濡染了纪实性的风格。同时，由于受到报纸发行节律的影响，副刊也带有一定的及时性，以及时效性。与报纸的新闻本性最为适应的文学文体应该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长篇的纪实文学，所立足的是真人真事，其文学性往往表现在细节和文字的修饰等方面。纪实性的散文，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及时点评，也是适合新闻性的文体。现代报纸副刊散文，大多具有世俗性，诸如批评性（杂文）、休闲性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是不适合报纸的文体。但是，张恨水的小说大多在报纸副刊上连载，这显然是由于他的小说吸收了新闻性，具有强烈的现实的世俗性生活性元素。

张恨水的报纸副刊创作，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性和世俗性，也由于新闻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当小说融入新闻元素的时候，也增强了它的活力。

四、张恨水小说的新闻性与审美性的平衡

张恨水小说同时也存在着审美性和新闻性共同的悖论。小说显然不是报告文学，它可能是以真人真事为背景，或者为原型，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除了背景地点和人物之外，大多数都是虚构的人物。这是小说的特性决定的。有黑幕小说，采用隐喻和影射的手法来表现，但是，它与现实之间依然隔了一层。而且这种影射作用的生效，大多在当时的语境之下。一旦时效丧失，影射也可能失效。张恨水早年也创作过黑幕小说，也采用了政治隐喻和影射的手法，甚至在后来的创作中，尤其是《八十一梦》等作品中也是如此。这种隐喻手法的采用，一个是迫于作者的自我保护，尤其是负面影射；同时也是因为作者屈从于小说的文体需要。但不管怎么样，这其中都隐藏着作者强烈的新闻冲动，强烈的对于现实的干预冲动。这种新闻冲动与文学审美所需要的涵养性是有矛盾的。甚至可以说，它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审美涵养的损害。将文学直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用文学暗喻和影射现实，从而达到对于现实或批判或鼓励的目的。这将带来文学现实目的性的增强，导致文学表达的束缚。从审美中心主义来说，这样的创作，其审美性将要大打折扣。

在娱乐性方面，报纸副刊文学更强调其娱乐性，而纯粹的文学并不是没有娱乐性而是娱乐性相对不被强调，尤其在中国语境中。报纸副刊，其文艺作品，必须与正刊形成风格上的差异，以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因为正刊大多是新闻，大多关涉较为沉重的现实生活，因此，副刊就要彰显休闲性的一面。张恨水对于新闻纸副刊的特性的把握，也使得他非常注重小说的休闲的一面，诸如在创作中增强言情内容，增加故事性，以及趣味轶事之内的插科打诨的内容，等。这又必然导致小说的主线索和主导性审美凝聚点受到打扰，导致审美的稀化。尤其是这种休闲性，在新文化启蒙主义那里，因其不严肃而受到指责。

在介入伦理方面，新闻强调的是道德评价的中立，而小说则充满了伦理的评判。相对于新闻来说，在小说中作家更易于进行道德的臧否。张恨水的小说，不是自然主义的小说，他不是如新闻那样只要把事实报道出来交给受众就行，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道德倾向性。相对于新闻来说，小说使得张恨水更易于发挥自己对于社会的道德评判。这可能也是张恨水在搞新闻的同时，选择搞小说的动机。这也可能是当时的报纸在搞新闻的同时，又为小说提供版面的目的所在。

新闻与小说之间存在着张力，而张恨水的副刊创作，可以说很好地把握二者时间的平衡。

注 释：

[1]本刊编辑部：《浅谈报纸副刊的新闻性与时代性》，《新闻世界》，2010年第10期。

[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张恨水全集》第6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4页，。

[3]温奉桥 李萌羽：《论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海南师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 06期 。

[4]刘文辉：《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转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作者简介：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注，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